

康余炒粉

陈冲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我的家乡杨梅墟说到“康余炒粉”,真是“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”!

康余,姓陈,知义冲村人。打我认识康余开始,他的样子就定格在矮墩墩、黑黝黝、胖乎乎、笑呵呵的模样上。

康余有个绝活“炒粉皮”。他炒粉皮的地方,就在杨梅旧墟粮管所西侧下的廊寮里。农历每月逢二、五、八、十墟日,便在那里架上一口铁窝。灶旁放一张简陋的板桌,上面有粉皮、猪油、盐、酱油、葱花之类。烧的是木柴,那锅搞得歪歪的。康余掌勺,他的瘦老伴烧火,体形与康余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。但两人配合默契,大家称他们是“大唱妇随”的“最佳搭档”。灶的右边摆一张长方形板桌,旁边摆

着数张板凳。客人来了,就在桌旁的板凳上或坐或蹲,各取所好,悉听尊便。

客人落座后,康余听着顾客报的吃多少钱粉,他不用秤,而是用手抓起掂掂,取个大概。主客间,完全是那种彼此信任,多少一点不计较无所谓的情谊。

只见油锅烧得滚热,先从锅边放下少许猪油,当即发出“炸炸”声响。接着放下蒜子,稍后放下粉皮,锅里马上爆出“炸炸”声响。片刻,又从锅边浇下少许猪油,锅里再次爆出“炸炸”声响。与众不同的是,康余炒粉不在锅中央,而是在锅边缘。他用锅铲先来个推开,再来一个炒拌。那锅铲上上下下,左左右右,仿如舞蹈,给人美感,给人享受。柴火很猛烈,粉皮

下的铁锅被烧得吱吱作响。但油水多不沾锅,更不会糊,条条粉皮,清清爽爽,油光闪亮,柔韧喷香。将起锅时,放下少许盐、酱油、葱花,用锅铲左右一和,上下一炒,将色香味浑成一体。出锅上碟了,阵阵粉香,扑鼻而来,那颜色,那味道,用家乡杨梅话说,“香脱耳”!“冇得弹”!

坐在一旁的食客,早已垂涎欲滴,有的更是抓耳挠腮。但炒好的粉端到跟前了,有的却又装出一副斯文的样子,努力控制自己,叮嘱自己,别吃得太快,要慢慢人品尝,细细儿咀嚼,慢慢儿享用,有时还故意闭着双目,停顿片刻,仰着脸儿,显出一幅回味无穷、陶醉不已的模样。

那时粤西一带的农民,白天干

活均打着赤脚,只有到了晚上,准备上床睡觉了,才用木盆盛上半盆水泡下双脚,草草洗过之后穿上一双几毛钱的木屐。

这时长长的板桌旁,一圈儿的食客,几乎全赤着脚,有的狼吞虎咽,吃得呼呼作响,像风卷残云;有的细咽慢嚼,如品山珍海味;有的不紧不慢,中规中矩,目不斜视,食不言语,吃完了,叨根牙签儿,打着饱嗝,露出一副很满足很享受的样子,之后用搭在肩上的“水腰”擦擦嘴,慢悠悠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皱巴巴的二角钱纸币,毕恭毕敬递给康余。康余满脸堆笑,点着头弯着腰,郑重其事接过纸币,连说谢谢!

个别的吃了一碟,又来第二碟,这在当时算是“阔佬”了,乃至

在场者无不投过羡慕的目光、惊讶的神色。有些嘴馋的,口袋里没有钱,只好远远的站着,拿双眼直勾勾看着康余炒粉,食客吃粉,自个儿悄悄咽着口水……

下午三点左右,散墟了。那些吃过康余炒粉的人,在回家路上意犹未尽,彼此相见,又提起刚才品尝康余炒粉的美味,彼此夸个不停,赞个不绝。旁边没有吃上的,有点儿遗憾,有点儿失落,但听了众人称道,也不甘落寞,不甘低人一等,便频频点头,装作也吃过尝过的样子,附和着别人称赞,脸上流淌着得意的神情……

附近乡村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,盛夏晌午,便拄根拐杖,走到村中的大榕树下,悠闲地摇着

蒲扇,天南地北地聊着天。有时聊到康余的炒粉,忍不住便咽口水,凹瘪的嘴嗫嚅着,“什么时候,我们这些老不死也出杨梅墟吃上一碟康余炒粉,也算不白来世上一趟了。”这些闲聊的话儿,不经意间传到儿孙们的耳朵里,便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了,为此专程跑出杨梅墟买回一碟康余炒粉,一者给老人家解馋,二者也算尽了儿孙的一份孝心。

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美食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康余炒粉,无疑是当年家乡杨梅美食一绝了。现在,时过境迁,康余作古多年了,但他的炒粉,至今仍留在杨梅人的舌尖上,流传在杨梅人的口头上。

建设塘涵桥

张辉

需要,每家每户无偿贡献劳动

力。很快进入了施工阶段,大家都有自己干好自己事的主人翁精神,我们不仅发挥了有限资金的最大价值,而且工期抓得紧,五个多月,主体建好了。

桥主体刚建好的时候,桥下面的脚手架还未到拆除期。天公不作美,一场特大暴雨,导致河水汹涌而至,还没有竣工的桥压力陡增。加上上游堆积的浮水莲在水流的冲击下,全部由上而下堆积到了这座桥边,而因脚手架的阻拦,浮水莲根本飘不到下游去。有群众反映,浮水莲不断堆积,如果不及

时清理,桥有可能面临被冲垮的危险……“两委”干部、村里很多热心的群众,冒雨聚集在桥边。看着雨越下越大,看着浮水莲越积越多,看着桥的压力不断增大,大伙儿的心里急啊,怎么办?我二话不说,拿起竹篙,绑上安全绳,不顾阻拦跳

到水里,把那些浮水莲从脚手架的缝隙里推到下游去。此时,有些年轻一点的群众也效仿跳到水里一起奋战。另一部分不能下水的,就在岸边用工具把浮水莲捞上来。一个多小时、二个小时……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的奋战,堆积的浮水莲都被清理好了,河水终于畅通,桥的压力缓解了,桥保住了!“没事啦!没事啦!”大伙儿的欢呼声在桥的上空久久回荡……

桥建好后,不仅解决耕种难

的问题,还成为附近几个村委会

出行交流的主要通道。不时有

小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等从桥上

通过,偶尔撒下一串串欢声笑语

。河的两岸,水泥路面,美观的

护栏,岸边片片荔枝,果满枝头

已呈半熟,河清岸绿,一幅和美

乡村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开。

第一次照相

毛勇强

第一次照相,也值得写一篇文章?今天的青少年也许觉得是很新鲜的事情。但是,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,确实值得一写。

我的孩提时代,生活条件差的家庭朝不保夕,生活条件一般的家庭寅吃卯粮,生活条件好的,也顶多是一日两餐粥一餐饭而已。那时的小孩子,能够吃上一条雪条,饮上一杯冰水,吃上一个馒头,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。因此,哪来闲钱照相?

那时,我所在的圩镇照相店“仅此一家,别无分店”。尽管如此,依然门可罗雀,一年到晚生意很是清淡。唯有到即将放暑假时,有些中小学生光顾,才是一年一度的旺季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即将小学毕业了,看见一些同学结伴去照相留念,我也跃跃欲试。我一咬牙,将平时积攒起来的零用钱,全部拿出来,但还差一点。母亲知道后,给我补上“缺口”部分,终于凑够了照相的钱。我家就在圩上住,自认为照相是再方便不过了。于是,在一天的晚饭后,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平时舍不得穿的衣

服(其实也只是补丁少一点而已),用报纸包好,来到照相馆。可是,找到那唯一的照相师傅时,他却说:现在已是傍晚,光线很差,改天再说吧。说完,忙他的事情了。就这样,尽管我作了很精心的准备,照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。其实,对小孩子来说,几角钱已不是小数目。我生怕遗失了,便“上缴”给母亲保管。过了几天,我准备再去照相时,母亲却说等到春节再照吧。后来,我终于领悟到,那点钱可能被母亲“挪用”了。

转眼到了春节,我对一直到小学毕业还未照过一次相“耿耿于怀”。春节前,母亲将我的“专项资金”返还了,我还得到一点压岁钱,终于手头上有了余钱。但是,除夕那天买鞭炮与小伙伴打“炮仗”,加上买零食,转眼所剩无几。大年初一,当我决意准备照相时,却发现钱不够了。但是,照相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怎么办?我灵机一动,想到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黄祥。于是,早上八九点钟时我找到他,将来意和盘托出,想不到一拍即合,因为他也未照过相。就这样,我们凑

钱(今天所说的AA制)照相。我们结伴找到那位照相师傅,也许是对上次未为我照相有点内疚吧,也许是新年伊始吧,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,还拿上海牌照相机,带我们到陵江桥上取景照相。那时,街道破烂,乡村肮脏,树木稀疏,可供照相之处实在不多,于是,到陵江桥照相也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照相师傅认真作了“导演”,安排我们站在大桥的栏杆旁,背后有几棵桉树,母校破旧的教室,还依稀可照到秀丽的陵江。安排好后,照相师傅认真调好了焦距,然后反复告诫我们:千万不要眨眼。在他“一二三”的习惯口令下,快门响了。就这样,我和亲密无间的小伙伴圆了照相梦:童年的身影、稚嫩的脸庞,甜蜜的笑容,定格在那张黑白照片上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我依然十分珍惜这张来之不易的照片,小心翼翼地保管着。前些年,这张相开始模糊了,我找到当年照相师傅的儿子来翻拍,效果比较好,这使我十分惬意!

昔日的茂名教育学院老师

王平生

茂名教育学院在38年前的1985年创建,学院的师资(教师)

几乎都来自茂名各中学教学骨干,其中教学艺术精湛,学术研究颇有成就的拔尖老师不少。

如哲学老师徐林均是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、从电白四中抽调上来的,他的课堂教学功底好,课堂教学经验丰富;中共党史教师是个讲客家话姓祝的老师,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(部队文书),他讲课时不时拿出口袋里曾荣获的各式勋章来做实物教具言传身教,他学术虽不很高精尖但底色很红;上科书社主义课的是当时的茂名教育局局长刘寿华,刘老师讲课很接地气,用通俗易懂语言及亲身经历为辅助教材,让我们耳目一新,几年后他被调到广东教育学院,负责《教育管理与督导》主编,笔

者多篇教育管理论文是经他精心编辑刊出的。

最令我终生难忘的课程,是两位从国内名校聘请来的教育专家。一位是李方教授,他是原华南师范大学著名教育学教授,他老家在电白沙院镇。本院第一届全体学员三百余人集聚一堂聆听他的教育学公共专业课。他讲的课有很强的震撼力,且百听不厌,听他的课如饮甘霖、如沐春风。他是1978年考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生,他出身于民办教师,教学经验丰富。知识渊博,讲起课娓娓动听,信手拈来且又接地气。他学术研究成果饮誉国内外,曾跑遍国内外著名大学讲学。所以他讲的课很有听头,趣味盎然,全级学生像侦察兵那样都全神贯注、目不转睛地聆听他的教诲。

不久他当了湛江师范大学的学院院长。

还有一位出身籍贯学历和李方教授相仿的教育心理学骆铭骏老师。他的教育心理学课也令人拍案叫绝!他屡屡用高超的语言艺术、通俗易懂又接地气的教法,用名联、格言、寓言、哲理名言等,深入浅出地讲透了高深无比的心理学专业知识。他用富有才气的独特的课堂艺术手法,让奥妙无穷的心理学专业道理深深烙印于学员的心田。听他的课也是一种奥妙无穷的的高级艺术享受,听他讲课很过瘾。

总之茂名教育学院给笔者提供一个人生长成必不可少平台,在学院能遇到言传身教、教艺精湛的众多老师,这是笔者难能可贵的人生际遇。

回母校



图为笔者与老师在曾经学习过的教室前合影留念。

难忘那个夜晚

谢志梅

总也忘不了,那个夜晚的歌舞,那是我生命里最早接触的文艺;总也忘不了,那个夜晚发生的事,它成了母亲心中久久难以排解的懊悔与愧疚……

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仲夏之夜,夜幕刚刚降临,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便沸腾起来。“大队文艺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了!”村民奔走相告,喜气洋洋地赶往村头。

“妈妈,我要去看演出,人家早就去了!”

“妈妈,我也想去!”

七岁的我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床前跺着脚说。

“你们不要吵,等弟弟睡着了我就带你们去。”妈妈轻声说。

终于,妈妈捧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,轻悄悄地锁上家门,带着心急火燎的我和妹妹去看演出了!

演出在村头一个宽阔处进行,离我家有两三百米远,一户人家房屋背面洁白的墙壁是“舞台背景”,墙壁的一侧垂下两米宽的一面绿色布幕,那面白墙壁的上方吊两盏汽灯(一种用煤油的大灯,点亮前要加大气压)。这些便是整个“舞台设备”了。村民们在白墙壁与那面绿色布幕前围成个大半圆,小孩们在前,有的席地而坐,有的坐在矮板凳上;大人们在小孩们的后面,有的坐在长凳上,有的站着。我们娘儿仨走得急,顾不上带凳子,妈妈让我带着妹妹钻到里面,再递给我们两截砖头当凳坐,她则站在外面。

我和妹妹终于坐稳了,只见“舞台”上正在进行歌舞表演,一群大姐姐脸上都化了妆,红红的,穿着白色的短袖衫、天蓝色裙子,双手拿着两朵用红布系成的大花,一边唱歌,一边跳舞。我只听懂一句:“我们从小爱祖国,爱祖国……”

歌舞结束,演员们退到白墙壁一侧那面绿色的布幕后。这时我才注意到,那布幕的前面坐着几个不是我们村的人,其中一个剪平头的中年男人正在把玩一把椅子上有点像蒲扇的琴,他旁边那个额上绑着条红布的青年男子是我们大队学校里的老师,他也趁这节目的间隙调试着手中的二胡。另外两个陌生人脸前的桌子上,摆着一个红色小鼓,一副小小的铙,一支横箫。

我正好奇地看着这些的时候,一个大姑娘从布幕后走到白墙壁前,对大家说:“乡亲们,请看下一个舞蹈。”说着,她右手掌靠在嘴巴旁,左用向前摊,唱开了:“哎!社员们呀,社员们呀,人民公社,好社员……”六个大姑娘成一个纵队快步从布幕后走向前来,随着歌唱的节拍,做出播种、插秧等动作。

这个节目结束后,刚才唱歌的那位大姑娘又出来报幕了,只说三个字:“高中生!”

随后,一个梳着两根短辮的大姑娘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出来绕“舞台”走一圈后放下,从箩筐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“语文”两个字的书,站着认真地看了一会儿,然后双手把书捂在胸前,右腿向前迈一步,踮起左脚,双眼朝远处看,仿佛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正为她不出声而感到纳闷的时候,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我回头,看见妈妈在外面一个劲地催我出去。

看到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从里面出来,妈妈递给妹妹一个她刚买的香喷喷的“禾钱糕”(一种油炸小吃)说:“快,要回家了,弟弟醒来了会哭的。”

妈妈一手捧着煤油灯,一手拉着妹妹,走得很快,我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紧跟着。离家还有十多米远,我们就听到弟弟的哭声。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我们家一侧那